



副刊能体现报纸的特色

卫建民

孙犁先生曾戏称他是天津日报社的“二副”——副刊科的副科长。用他一篇随笔的题目说,这也是他的“位置和价值”。对办好副刊,他写过几篇具有指导意义的辟论说明,改进要点和启事,从办刊方针上提出“文艺周刊”和其他文艺副刊专版的要求,体现了他的编辑思想,决定了《天津日报》副刊在京津冀乃至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力。天津因在地理空间上近临北京和河北,有几年又曾是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所以创刊后的《天津日报》就有覆盖三地的副刊,而副刊创刊号的重点作品是刘白羽的特写《光明照耀着沈阳》(转载)。区域性的“文艺周刊”,作为纯文学园地,曾先后培育出好几位全国知名的作家,早已成为文坛活话。

报纸有副刊并形成自身的独家面貌和“卖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副刊成为发表新文学作品园地,许多著名作家、诗人,正是从报纸副刊开始登上文坛的。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在《晨报副刊》,小说的第一章刊于“开心话”栏目。从副刊编辑的志趣看,这个栏目发表的是娱乐性、消遣性的小说,是供人茶余饭后开心的闲书。《阿Q正传》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意义,小说内涵的文学革命飓风,以及对国民品性的批判精神等,当时的编者还没看出来;但是,在第一章见报后,《晨报副刊》的编者觉察到文本

的分量,将后续章节从“开心话”转到“新文艺”和“文艺”栏目进行连载,震动京华,甚至有读者按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对号入座。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也是发表在《晨报副刊》,并引起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学者林宰平的关注,随即发表评论,赞赏青年沈从文的文学天才。诗人徐志摩在接编《晨报副刊》后,频频发表沈从文的作品,并以编者的名义为其作品叫好。报纸副刊发现了优秀的作者;优秀的作者吸引了副刊读者。对初学写作者来说,编者的肯定增强了作者的信心,并建立起作者和编者之间真诚的友谊。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遇空难去世,沈从文专程从青岛赶到济南朝弔,不能不说是抱着知遇之恩。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普遍重视并发展文学副刊。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主管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对办好副刊提出许多要求,具体到要求《人民日报》多发表杂文,指出杂文在这个时代应有的倾向性以及作者的情绪对读者的影响。他对报社领导发表内行意见,自己也带头写杂文,还给报社编辑部介绍作者。从《胡乔木文集》和《乔木文丛》可以看到,他以极浓厚的兴趣关注副刊,仔细阅读副刊作品;发现错别字还要及时指出。这个时期,各家报纸副刊发表的作品,有的成为作家的成名作,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在《河南日报》副刊;特别是杨朔、秦牧、邓拓等作家的散文

作品,风靡一时,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展现了时代的表情,创造了新的散文文体。

作为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优美、耐读的副刊作品延长了报纸的寿命,名家名作更给报纸带来声誉。在信息相对落后的年代,尤其是经过社会长期动乱后,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能成为政治晴雨表。1977年5月,巴金先生在《文汇报》副刊发表《一封信》,文学界奔走相告,全国读者都为之感奋,叶圣陶先生读后写诗:“今春文汇报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在某个历史时期,副刊能成为舆论高地和作家亮相的舞台,读者能从作者文章里发现新闻,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研究现代中国新闻史,报纸副刊本身就具备此功能,仔细看,是能看出清晰脉络的。

进入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从过去的广播电视报纸升级到人人一部智能手机,掌上阅读即可知道天下大事。我是常年读报的人,每天收到几份报纸,不由自主地先从后面的副刊翻起,看看有没有可读的文章;因为我首先关心的国内外大事,已经在手机上看到了。从副刊读起,就像开盲盒一样带着期待。根据我这个忠实读者的读报心理,我建议报纸务多重视副刊的地位和作用,务必从副刊阵地巩固和发展报纸的特色。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



了,特意托编辑老师与我联系,指教其中一些观点。得知这个消息,我既惊喜又感动。林希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天津作家,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来自漫长而深厚的生活积累,他竟然会关注到我这篇小文,这让我感到文学讨论可以如此自然地跨越年龄、地域与身份。

我写的《吴祖光新风霞的津派戏剧创造》经中国作家网转载后,一位曾与吴祖光先生共事的老师主动联系了我,谈起许多亲历的剧坛往事。那些鲜活的细节,有些是书本和文献中难以读到的。原本只是一次基于史料的研究与写作,却因此延伸出新的交流,也让我对所研究的人物与历史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这两件小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篇文章的发表并不意味着写作的结束,有时反而是另一段对话的开始。报纸副刊让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因文字而相遇,让不同代际的经验彼此补充,让沉淀在个人记忆中的文化往事重新进入公共视野。这种交流远比发表本身更为珍贵。

我也常把这样的感受讲给学生听。今天,社交媒体让发表文章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如何认真完成一篇文章,如何面对真实而陌生的读者,如何接受编辑的意见,仍然需要学习。我鼓励学生向报纸副刊投稿,是希望他们走出课堂,发现值得书写的生活。一篇稿件从构思、修改到投稿、发表,甚至被退稿,都是写作者成长的一部分。副刊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和编辑传统,帮助年轻人理解什么是

有价值的表达。

《天津日报》副刊本身也有着令人敬重的历史。1949年创刊的“文艺周刊”,曾由孙犁等文学前辈辛勤耕耘,历经数十年而薪火相传。想到自己只是这条漫长文字河流中的一名后来者,便更能体会其中的幸

运。尤其感谢编辑老师们每次对稿件的细致审读和耐心沟通。一篇文章能够最终与读者见面,背后都有编辑不止的心血和劳动。

从研究副刊到为副刊写作,我渐渐明白,副刊之“副”,从来并不意味着价值的次要。它或许没有新闻版面的紧迫感,却能为时代留下更细腻的感受;它未必总是讨论宏大的问题,却能从寻常生活中发现值得珍视的意义。它既容纳大家名家的深思,也愿意倾听普通写作者的心声。

对我而言,副刊让我相信,文字的价值不仅在于被发表、被保存,更在于被另一个人读到、理解,并由此生出新的思考。一张报纸每天都会翻过新的一页,但那些轻盈的文字留下的感触,却可能长久地留在人心里。这大概就是我与《天津日报》副刊结缘以来最深切的感受。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副教授,青年评论家)

文字轻盈 回响悠长

杨一丹



踏影寻香(中国画) 王少桦

津派文化大家谈

自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来,就有书法家开始将甲骨文字作为笔墨书写的表现对象,这样,作为甲骨学分支之一的甲骨文书法就诞生了。不过由于甲骨文字数量偏少,总数不足5000单字,被确认的也仅1500字左右,所以甲骨文书法不适合创作长篇作品。于是,甲骨文书法家们不约而同地书写吉言、成语和集较短诗词联语,尤其是后者,即甲骨文集联,就成了充分利用有限的甲骨文字表现传统雅致内容的“戴着脚镣跳舞”艺术形式。而甲骨文集联形式的形成,就始创于天津,并影响到现在。

作为“甲骨四堂”之首的罗振玉,于甲骨学研究厥功至伟。同时,罗氏也是甲骨文集联的开创者,由他编纂的甲骨文集联对甲骨文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

1919年,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后,客居天津做寓公,直到1928年离开津门之前,一直居住在嘉乐里。1921年3月,罗振玉在自家开设的天津貽安堂书局出版了《集殷虚文字楹帖》。该书共收99副集联,其中包括四言联语11副,五言61副,六言4副,七言5副,八言18副。这是中国第一部集甲骨文字为联的书法工具书。

罗氏于《集殷虚文字楹帖》后跋中谓:“自客津沽,人事旁午,读书之日,几度大半。去冬奔走南北,匍匐赈灾,四阅月间,益无寸晷。昨以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先后三夕遂得百联。存之中帙,用佐临池。辞之工拙,非所计也。辛酉二月雪翁记于嘉乐里之股礼在斯堂。”

罗氏的《楹帖》及后来人们的续集,成了那些没有条件见到甲骨文实物的人士的临习法帖,许多书法家学习甲骨文书法都是从这类甲骨文集联入手的,其影响所及之深,至今不衰。所以,难怪人们说起甲

最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接连刊文讨论报纸副刊的价值。王蒙先生谈副刊的“郑重与轻松”,《人民日报》以“居‘报尾’而向‘潮头’”概括其文化担当,《光明日报》则强调副刊绝非报纸版面的“补白”。读到这些讨论,我颇有感触。作为一名研究现代报纸副刊的学者,又有幸成为《天津日报》副刊的一名作者,我对副刊的意义有着双重的体会。

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副刊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纸孕育了丰富的文学园地。尤其是《大公报》,从“小公园”“艺林”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很多重要足迹。沈从文、萧乾等作家与之渊源深厚,曹禺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我如何写《雷雨》》,《日出》还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研究这些历史,我愈发感到,副刊并非文学史的边角,而是文学发生、传播与成长的重要现场。许多后来享有盛名的作家,也曾是向报纸投出第一篇稿件的年轻人。

大约从2022年开始,我尝试向《天津日报》副刊投稿,将日常阅读、观剧、旅行和研究中的一些感受写出来,与更多人分享。这些文字陆续得到编辑老师的认可,也让我渐渐养成了为副刊写作的习惯。

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论文和专著有其规范与周期,但生活中的思考往往来得更为轻盈、及时。一场演出刚刚落幕,一处名胜偶然触动心弦,一次阅读带来新的发现,便有了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些思考未必足以支撑一篇论文,却又不愿让它们随时间消散,而副刊恰好为它们提供了安放之处。

这些年,我格外关注天津正在发生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常常能在熟悉的街巷中发现新的意味;在国内外旅行,也常留意一座城市的文学遗迹、戏剧活动和文化生活,头脑中总会涌现出一些对比性的观察。副刊让我学着把专业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转化为普通读者愿意阅读的文字,不必处处引经据典,也不必急于得出宏大的结论。我越来越觉得,副刊给予写作者的一份珍贵礼物,就是让那些尚未长成鸿篇巨制的思想,也有机会被人认真对待,并及时与读者见面。

更让我难忘的,是文字发表之后那些意想不到的“相逢”。

我曾在《天津日报》发表《探索中的津派戏剧》,讨论天津戏剧的地域文化传统及其艺术探索。文章刊出后,远在美国的林希先生读到

甲骨文与天津(十二)

文书法,大都视罗振玉此集联楹帖为开山鼻祖。罗氏虽然受甲骨文字释读数量所限,再加上当时甲骨文书法处于草创阶段而无所借鉴,不可避免有许多问题,甲骨文字也多有不确之处,但是该书基本如实遵照了甲骨文字的本形,不做随意省改,又造型工稳,还是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的。从《集殷虚文字楹帖》序跋中可知,罗氏晚年应酬赠送的书法作品,多以甲骨文集联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如今存世的罗氏甲骨文集联书法作品颇多,且价值不菲,成为当今艺术品收藏界的抢手货。

甲骨文与天津(十二)

朱彦民

罗振玉之后,受其影响,继续集甲骨文为联者,有同样寓居天津的章钰、高德馨和王季烈三人。1925年,罗振玉将章、高、王、罗四家所集汇为一编,亲自“缮写,付之手民”,却将自己的集联放在三家之后,其谦恭态度令人敬佩!这就是1927年由东方学会印行的《集殷虚文字楹帖汇编》一书的由来。

罗振玉在《汇编》新序中云:“辛酉年仲春,集殷虚文字为偶语百联,以为临池之助。已而,老友吴中章式之外部钰、高远香文学德馨、王君九学部季烈,先后继作。予嗣是又有续集。于是四家合得四百余联,汇成一集,欲手写流传。人事牵阻,屡更岁月。而去冬辛酉奇灾,不意自生全。今年戎马生郊,益无聊俚,乃始从事缮写,付之手民。盖忧烦琐之余,舍此无以遣日。读者幸毋以为文雅之娱也。乙丑孟冬上虞罗振玉。”

《汇编》所收四家集联情况,其中章钰所集共134副,高德馨所集共85副,王季烈所集共24副,罗振玉所集(含续集增补)共177副。四家合计,《汇编》共有甲骨文集联420副,厚厚一册,颇成规模。《汇编》所收甲骨文集联,比罗氏原书多出300多联,给甲骨文书法家和爱好者的查询、利用带来极大方便。

1985年3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也对《汇编》作了整理,由吉林大学出版社放大影

印出版。书后面附有罗振玉嫡孙罗继祖跋文、古文字学家姚孝遂先生校记。其中姚先生的校记非常必要,有助于纠正早期甲骨文书法中的文字错误和随意书写等弊端。后来罗振玉孙女罗琨女士对姚氏的校订本复核作了一番校订,使得该集本的文字释读水准达到了甲骨文释读的最新研究水平。依照两家的校订,其中甲骨文字庶几可无大碍,可放心使用。只是没有沿用罗氏原来的书名,删去“汇编”二字,定为《集殷虚文字楹帖》;同时将《汇编》中编者的顺序由章、高、王、罗改为罗、章、高、王,使罗振玉的地位由殿后而改成领首。这样做既不符合实际,又有违罗氏当年不设同好之雅意、自谦礼让之高风,实在有些弄巧成拙。后来该书又由多家出版社重印,依然如此,仍承其误。

在罗、章、高、王等人之后,天津甲骨学家王襄也有甲骨文集联传世。

甲骨学研究之外,王襄先生也是一位功力深湛、古雅高华的书法家,只是其书名为其学名所掩。同样也是受罗氏影响,为了方便自己或别人书写甲骨文书法,王襄也很早就开始了甲骨文集联的创作,先后集成了《董室殷契集联》(题寄刘贞甫卜文集字)、《董室集古籀文联语》等三种甲骨文集联之作。这些作品,少数散见发表于天津报端,但因为没有正式出版,大多数集联不为世人所知。其中《董室集古籀文联语》(1936年)保留了下来,共二卷,收联语554副,在下卷中收录了甲骨文集联8副。该书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从此集联文本和传世的王襄甲骨文集联书法作品来看,王襄先生的甲骨文书法,虽结字以甲骨文字形为意,然而其用笔仍是沿用金文大篆的写法,故其甲骨文书法厚重质朴。这很符合早期甲骨文书法大都借鉴其他书法笔意的时代特征。

王襄之后,津门甲骨文书法家众多,书写甲骨文书法也多用甲骨文集联形式,但都没有自创自撰的甲骨文集联作品集问世。只是在2018年11月和2024年10月,本人分别在天津美术馆和南开大学海冰楼举办了“殷契抒怀——朱彦民甲骨文集联书法展”和“契文传道——朱彦民甲骨文书法展”,两次展览都各有书法集出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甲骨文集联。

(朱彦民的系列文章“甲骨文与天津”至此已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刊将连续刊发薛冰的系列文章“南美行纪”。——编者)



洁上
丛话

档案文献里的长征记忆(十二)

长歌不憚征程艰

魏巍



顶敌机狂轰滥炸,地面敌军轮番冲锋,原本五六千人的部队战后仅剩两千余人,湘江之水被烈士鲜血染红。湘江战役之后,当地百姓立下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誓言。这一幕幕浴血场景,深深镌刻在萧华的记忆深处,日后化作了《长征组歌》中“跨过五岭抢湘江”“前仆后继杀虎狼”的悲壮诗行。

遵义会议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损失惨重的少共国际师进行了重新整编,将其分别编入红一师、红二师和红一军团直属部队。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继续随军征战。四渡赤水,他深入敌后,形象地展现长征的壮阔历程与精神内核。为便于后续朗诵与传唱,他创造性使用“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由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组成,共12行68字,一诗一首。他按照长征的历史脉络,选取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12个标志性节点,以亲历者的视角逐段铺陈创作。

王新兰同样是长征亲历者。她回忆那段时间,居

间,为他们细致讲解每一首诗的历史背景与情感内核,为作品的后续打磨奠定了坚实基础。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萧华创作的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为红军长征三十年而作》,紧接着《解放军文艺》7月号也在首篇刊载组诗,此时萧华已经由杭州转至天津疗养。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战友歌舞团决定7月下旬在天津人民礼堂进行预演。当天,礼堂内座无虚席,不少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专程前来观看。《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激昂灵动、《过雪山草地》的沉郁坚定、《大会师》的豪迈欢欣,每一段旋律都牵动着他们深藏心底的记忆。演出结束后,萧华激动地对主创人员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首演,引起强烈反响。首演之后,周恩来接连三个晚上前往观看演出,每次结束后都留下来和主创人员、演职人员交流感受,逐段提出修改建议。据统计,周恩来先后17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演出。1966年,周恩来率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特意安排《长征组歌》剧组随行,连演数十场,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让这部红色经典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即使到了1975年病重住院期间,周恩来仍特意收看了《长征组歌》复排演出的实况录像,临终前,他口中仍念着《过雪山草地》里“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诗句,这句凝聚着长征精神内核的歌词,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生动写照。

首演之后,《长征组歌》开启了全国巡演。在此后的岁月里,《长征组歌》历经多次复排,始终是中国文艺舞台上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1975年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时,邓小平同志亲自推动复排工作,萧华对歌词作了精心修改,作品再度轰动全国。从1965年首演至今,《长征组歌》在国内外累计上演数千场,成为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又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大型声乐套曲,被誉为“革命的大合唱,大合唱的革命”。它寄托着人们对长征的纪念,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偉大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

插图: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刊发的萧华《红军不怕远征难——为红军长征三十年而作》。

(作者系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工作人员)

第五五〇一期

